

畢業六十年生涯漫談

謝福生

資深系友楷模獎



感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45級(民國四十五年)畢業的 謝福生系友校長
對母系及系友會的卓越貢獻 特此致謝。
由歐陽鍾玲系主任代表母系頒贈

2016年6月5日

承邀對畢業六十年一甲子的時光作一番回顧，感到非常榮幸，但是回想自己，一生碌碌，講不出什麼宏論高見。祇是一個平凡的人，懷著平實的想法，做著平常的事，過著平淡的一生。在歷史的長河中，只是一粒細砂，留不下什麼痕跡，可能有負各位的厚望，敬請各位原諒。

壹、十八歲之前的求學歷程

民國二十三年農曆八月下旬，我出生在江南，三足歲不到，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江南成為淪陷區。戰爭摧毀了多少家庭 - 包括我的家庭，從此殘缺不全。抗日戰爭勝利後，隨政府復員回到家鄉，已經是物是、人非、事事皆休了。

民國三十七年春三月，隨親長來台，婆婆之島，美麗的台灣，從此成為我成長、處事、安身、立命的地方，成為另一個家鄉了。民國三十八年夏，我在省立台北成功中學初中畢業，隨即升入高中；四十年春，插班轉入省立新竹中學。

省立竹中，學風好，升學率高，校長是著名的教育家辛志平先生，他注重身教，重視體育和群育活動，每年都要舉辦越野（賽跑）和音樂比賽，省立竹中的合唱團是很出名的，雖然全部都是男生（聲），但在全國性競賽大都能得獎。竹中是一所完全中學，高初中各年級各三班，全校十八班，約一千餘名學生，在今天看來規模似乎不大。中央研究院前任院長李遠哲，亦是竹中畢業的，他低我一屆，我們並不相識，這是以後有人提起才知道的。辛校長在新竹市東門街的舊居，今日已保留為紀念館，供人憑弔追思。我們以做辛校長的學生為榮！

民國四十一年夏投考大學，那時候全台灣的大學祇有四所，完全大學祇有國立台灣大學一所，其餘三所都是獨立學院，即是在台北的省立師範學院，在台中的省立農學院，在台南的省立工學院。暑假招生各自辦理，沒有聯合招生（民國四十三年才有四所學校聯招），但不會撞期。大學入學考試分甲、乙組（理工和社會），除國、英、數必考外（數學試題大概有區分），前者考物理、化學；後者考歷史、地理。我記得中外史地合成一科，共考四科，以四科總分計算，似乎亦有依系別加權計分的錄取者。

師範學院入學考國文科試題中有 10 分（不知是否還是 5 分）是考國語注音。我在小學、中學階段，從未學過注音，祇好留下空白。入學師院一年級必修國語注音的課程，不給學分，但必須通過；要學會拼讀，還定有標準考試，不通過就不能結（畢）業。同班同學真有因注音標準考試沒有通過而結（畢）不了業的。有人抗議說，我們的領袖（指當時執政的蔣中正總統）一口江浙口音，他國語講不好亦一樣做領袖，為什麼要求我們這麼嚴格呢？結果當場就有人回應說：他做總統這樣是可以的，你做教師，這樣是不行的！，可謂「一語中的」，真是「總統、教師，各有天命，不可強也！」

貳、進入母校史地學系的學習時光

我入學師範學院的時候 18 歲，正是我國學制正常的年齡（6 歲入小學，12 歲小學畢業，15 歲初中畢業，18 歲高中畢業），這是非常慶幸的。因為在動盪的時代裡，國難、家難，學業受到耽誤，無法正常入學。很多同屆入學師院的同學，有的年齡較長，有民國 15 年、16 年次出生的，入學的時候就已經是 20 多歲了。最長的有一位民國 12 年出生的，到今年已經 90 歲出頭了。還有一位本省籍的同學是民國 17 年次出生的，曾經被徵召當過日本殖民時代的航空少年兵，所幸第二次世界大戰因為投擲原子彈而提前結束，沒有被帝國主義的侵略浪潮犧牲掉！

民國四十一年秋入學師院的時候，和平東路的新校區才開始興建，圖書館設在行政大樓三樓，閱覽室的空間不大，書庫亦不是開架式的，藏書大概不到十

萬冊。劉真老師擔任師院院長，那時才 40 歲出頭，充滿朝氣和活力，每天早晨都要率領全校住校同學參加升旗，並作早操；除朝會外還有週會，全校學生要輪流參加週會（因為禮堂不能容納全校學生）。這在今天講究「自由」的大學生活來說，這似乎是不可思議的「天方夜譚」了。

劉真校長（民國四十四年師院改制為師範大學）在民國 46 年 8 月調離師大擔任台灣省教育廳廳長，在師大的惜別茶會上曾很自豪的說：「過去八、九年當中，我那一天沒有到校升旗？你們可以查一查！」這種鏗鏘有聲，以身作則的教育家風範，永遠讓人致敬！

週會的時候，經常邀請校內外學者演講，校內有梁實秋、田培林等名家；校外有胡適之、王雲五等大師。記得在我入學的那一年（41 年）12 月，曾聆聽胡適之先生的演講，講題是「杜威哲學」。

進入師院早期磚紅色的舊大門（改師大的時候拆除重建），經過圓形的花園和水池，踏進行政大樓（第一大樓）的大門，門首揭示「止於至善」四個大字，它警惕著進入此門的師院學生，不達「至善」的境地，努力就不能終止。勤學、進德、健身，就是師院學生要終生履行貫徹的信條。

入學師院史地系之時，系主任是沙學浚老師，一年級的「地學通論」和二年級的「地形學」和實察都是章熙林老師擔任。那時史地系既未分系（51 年分系）亦未分組，但三年級之後可以選課來調適自己的興趣。可供選修的科目，似乎亦不多，在記憶中，似乎歷史部分的教授陣容較為堅強，有通史，各斷代史的權威學者開設課程。除了郭廷以、王德昭、朱雲影、李樹桐老師等專任外，台大歷史系的教授亦多是中央研究歷史研究所的著名學者，如勞幹、姚從吾、沈剛伯老師等都來師院兼課。地理部份的選修科目似乎不多，有沙老師的「邊疆地理」、朱祖佑老師的「海洋學」、薛繼堦老師的「氣候學」等；必修的有王益厓老師的「中國區域地理」、鄭資約老師的「世界地誌」、王華隆老師的「本國地理總論」等。時隔六十多年，記憶已經不很清楚，不過總覺得四年所學，不夠紮實；尤其是「讀圖訓練」、「野外實察」的訓練工夫似乎不夠。那時當然還沒有「遙測方法」和「GIS」的應用訓練，「計量地理」亦祇是一個名詞，課程亦未開設。這應該是應了一句老話：「師父領進門，修行看各人」，埋怨自己「既入寶山，卻空手而歸」留下的遺憾了！

今天回憶入學師院後的老師們，他們大多已經凋零，但在歷史的舞台上都留下了漂亮的身影和影響力，他們的音容笑貌和治學的功力，讓我們後人一受益者，久久不忘！

大一英語課是胡浦清老師授課，選讀的課本第一課就是 "If I were a freshman again." (假若我再做一次大學的新鮮人)。當時年少無知，不能深切體會其中涵義。胡老師作風十分洋派，對男生稱「先生」，對女生稱「女士」。有一次上課時提問題，對班上陳慶捷同學提問：「Mr.陳，你貴姓？」語聲一落，全班哄堂大笑，知道陳同學姓陳還問他「貴姓」，使人丈二金剛摸不著腦袋，這大概是「胡氏」的幽默吧！

大一「中國通史」是由李樹桐老師講授的，李老師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的，(學識)非常淵博。課程內容應該從古貫通到今(通史)，可是祇講到唐、宋之際，學期就結束了。因為李老師講課內容細膩豐富，十分動人，譬如一場楚漢相爭的鴻門宴，或者唐代李世民兄弟的玄武門之變，都可以講上一個小時，講授的時間自然就不夠了。好在以後還有很多斷代史可供選讀。

大一「西洋通史」是由曾祥和老師講授的，曾老師是北平師大畢業，當時才三十來歲，她採用海思(Hayes)、威蘭(Wayland)等合著的「世界通史」為藍本，使我們對西洋史有一系統概念，幫助我們以後選讀西洋上古、中古、近世史等奠了基礎。曾老師是沈剛伯老師的夫人，沈老師是知名的西洋史學者，他當時擔任台大文學院院長，亦在師院兼課。一頭蓬鬆的白髮，戴著深度的眼鏡，不看講稿，侃侃而談，他們是師生相戀而終結連枝，白髮紅顏，是學界的一大佳話。

王華隆老師講授「本國地理總論」，王老師年高德劭，輩份很高，他早歲畢業於北京師大研究院，為人溫和，談吐詼諧有趣。他講到早年海外華僑在歐美創業的故事，豆腐是中國人發明的(相傳漢代淮南王劉安發明製造的)，外國人沒有豆腐，華僑在(歐美)海外開設豆腐公司發大財的傳奇故事，讓在教室聽課的同學嘖嘖稱奇；還有人為此想在海外開設豆腐公司，做著發大財的春秋大夢呢！

王益厓老師講授「中國區域地理」，他是日本高等師範畢業，法國巴黎大學文學博士，來台在廣州中山大學擔任地理系主任，王老師年歲較高，那時已近六十了，鄉音很重(王老師是江蘇常熟人)，不太容易聽懂。民國四十一、二年的時候，他的著作「中國地理」上、下兩厚冊尚未出版(以後由正中書局出版)，上課時分發講義；王老師自己拎著包袱，裝著教材，一上講台立刻開講，從不說廢話。教材內容非常豐富，很多名詞對我來說都是首見，如新華夏大內斜、大外斜等。對中國地理區(區域地理)的劃分，王老師有他自己獨到的見解。爾後國內的地理學者沿襲他的區域(包括國立編譯館統編的高中地理課本)加以論述者很多；王益厓老師對中國地理學的貢獻是不可抹煞的。

沙學浚老師是史地系的系主任，全系的大家長，戴著寬邊的眼鏡，神情似

乎有些嚴肅，大家都敬畏他，我們學生背後暱稱他為「老沙」；暗中亦有人尊他為「沙皇」的稱號。

班上張朋園同學一年級下學期申請轉入教育系，轉系一定要系主任同意。張同學拿著申請書去辦公室請沙老師批可同意。沙老師翻閱一下張同學的成績單，斷然說「你成績很好，不准！」這像當頭一棒打醒了他，激發了他求學的意志；幸而「不准」，從此專心致力於歷史學，終成大器。師大畢業後進入研究所，追隨郭廷以老師。任職於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謂「南港學派」），並在師大母校任教，擔任過歷史研究所所長，著作很多。

沙老師非常關懷學生，每年應屆結業的學生分發到各校任教，在推荐的信函上，一定親筆簽名蓋章，以示負責。沙老師開設的課程，有「國防地理」、「邊疆地理」和「製圖學」等；亦曾在民國 40-50 年代主持國立編譯館地理科編審委員會，負責高、初中地理教科書的編審工作。所謂「標準本」，就是沙老師主導的，對中學地理教育有深遠重大的影響。

沙老師在對日抗戰時期，在大後方四川中央大學等校任教，經常在重要的報刊上（如大公報、中央日報）發表專論，申述主張，學者論事，客觀中肯，備受重視。後來沙老師在新加坡南洋大學擔任客座，亦不改習慣，經常在當地報章發表專論。據說在上世紀新加坡脫離馬來聯邦尋求獨立之際，沙師曾發表專論，論述從地理條件觀察，新加坡不適合獨立為國家。這種論調開罪了李光耀父子，終使沙老師因而離開了南洋大學。這個傳說無法證實，但以沙老師文人樸實的性格而言，是有其可能的。

另外有關沙老師事蹟應該大書特書的一件事，就是「釣魚台」史地的考證和論斷。

民國 60 年代初期「釣魚台」爭論初起，沙老師發表「釣魚台屬中國不屬琉球的史地根據」一文。全文擲地有聲地說明「釣魚台」是被中國人「原始」發現而非被琉球人發現。提出很多文獻上的證據，包括有「釣魚台」屬於中國不屬於琉球的日本官方文獻（見於日本外交文書）。最後的結論是：

從歷史上，地理上，使用上，法理上，釣魚台列嶼是台灣的一部分；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是中華民國（學粹雜誌 14 卷第 2 期 61 年 2 月）。

在民國 70 年代中期，保釣風波再起之時，我在國立編譯館中小學教科書組服務，曾經製作「釣魚台簡介」小冊，將沙老師這篇宏文納入，分送全國中小學地理科教師，作為重要的教學參考資料。

參、地理研究所專業進修時期

民國四十五年夏（60年前）結業後（那時還不能算畢業，要實習滿一年且成績及格後才能畢業），分發到新竹任教（所謂實習教師）。九年國教是在民國57年實施的，但在民國45年夏，張曉峰（其昀）先生擔任教育部長的時候，就在新竹縣（那時縣市尚未分治）實施「國小免試升入初中方案」，這在我國教育史上是一件大事（現在似乎不被談起）。那時候小學（國民學校）生升入初中要經過考試，小學五、六年級11-12歲的學童補習的情形非常嚴重，永無止境的雞兔同籠問題，植樹問題，時鐘計算問題等等，學童身心受到很大創傷。為了配合實施免試升學，新設了很多所初級中學，師大應屆結業生分發到新竹任教的人數很多，我是其中的一個，分發在新設立的新竹第二女子初級中學任教。很多新設的初級中學設備相當簡陋，學生因為不經考試，程度差異亦很大。這項在我國教育制度上的新措施，實施不過三年，就因為張曉峰先生卸任教育部部長而終止，政亡人息，非常現實，亦非常可惜。

這項免試升學的政策是否成功呢？評論不一，但是有一項事實可以證明免試升學的成果是功不唐捐的。

實施免試升學滿三年後，(48)學年度台北市高中聯招第一名錄取北一女的女狀元朱以錚，就是新竹第二女子初級中學第一屆的畢業生。還有一位體壇名人，有「飛躍羚羊」之稱的田徑名手紀政，亦是新竹第二女子初中首屆畢業的。她亦曾經為文感念這段幫助她長大的求學過程。我想：歷史就是這樣寫的！

在民國40-50年代初，國內學術風氣不夠濃厚，大學設置研究所的不多，除台大早期有若干研究所（祇有碩士班）外，在我畢業前一年（44年）師大才設置第一所研究所－教育研究所。全台灣沒有地理研究所，但風聞中央大學要在台復校，最先設置的就是「地理研究所」。這個傳聞，使人很興奮，記得母系賀忠儒老師鼓勵我們投考，曾經說師大史地系的畢業生如果沒有考上，會使他很失望。結果中大終於在中壢復校了，最先設立的研究所是「地球物理研究所」，根本不是我們研讀的領域，無法報考，真的讓賀老師失望了。

民國51年夏，前教育部長張曉峰（其昀）先生在陽明山華岡創設中國文化研究所，第一年設立十個學門，「地理學門」是其中之一。研究所比照台大、師大等公立學校不收學雜費，並提供獎助學金。消息傳出，大為興奮，可惜當年準備不及；第二年（52年）第二屆研究生招考，倖蒙錄取（地理學門），七名研究生中有六位是師大畢業的，有師大41年本科第三屆畢業的何金鑄學長。43年本

科第五屆畢業的崔尚斌，葉長齡學長。祇有一位是台大地理系畢業的周明達，他後來又進入美國紐約大學深造，在紐澤西太空總署服務。不僅是如此，中國文化研究所設置的各學門（各研究所），提供了師大歷屆畢業生升學的殿堂。師大學生貧窮，沒有財力（我在師大同班的同學中有好幾位同時考上台大，而選擇師院公費的）和背景可供出國留學深造，只好留在國內靜候時機，儘量尋找升學機會。我 45 級史地系同班同學中共有七位就讀中國文化研究所各學門。二位「歷史」學門，一位「實業計劃」學門（三民主義研究所），四位（包括我在內）先後就讀地理學門（地理研究所）。我校 45 級以後各屆畢業的史地系（或地理系）系友們進入中國文化學院（後改為中國文化大學）各學門（研究所）亦很多。記得有蔡文彩，鄧天德，曾珠珍，林文騫系友等。（在座的鄧國雄系友亦是師大地理系畢業後進入中國文化學院地理研究所，榮獲碩士、博士的）。母系的劉鴻喜老師亦在文化主持過地理系所一段很長的時光。後這些淵源上看，師大史地系（今天的地理系）和文化大學的關係很密切，人才培育、學術交流，似乎可以寫出一章共同的歷史。

當時文化地理學研究所主持人是孫宥越老師，孫老師亦曾在師大任教，孫老師是法國里昂大學的地理學博士，人文主義學派，描述地理景觀非常細膩，文學的氣氛濃厚。（孫老師的親兄長孫亢曾老師曾經擔任師大母校的校長，兄弟倆都是俊傑。）他鼓勵我們作小區域的地理研究。我的論文題目是「三重地區之地理研究」，有的作「北基工業走廊之地理研究」、「淡水河口地區之地理研究」、「大屯山地形、聚落、氣候之地理研究」等等，以後各屆的論文題目，亦多以實地考察的小區域地理為主。目標是編纂一部完整的台灣新地志，作為未來我國全國分區新地志的楷模。

肆、任教於專科學校並擔任校長職務

民國 54 年夏，獲碩士學位後留校以專任講師名義任教。那年文化學院大學部剛成立，創辦人張曉峰（我們學生尊稱為張夫子）先生將一、二屆研究所畢業生全部留校，聘為講師，有的講授大學部基本學科，有的擔任行政職務。研究所第三屆畢業後，留校服務的畢業生已經飽和，所以為了留校與否彼此有著競爭。恰好那個時代（50 年代初）發展技職教育的聲浪響起，一時間起了高潮，全台創設了很多所五年制和二年制的專科學校，類別有工、農、商、醫護和管理等，全台師範學校亦先後改制為師專。一時之間，合格師資十分缺乏，這給研究所畢業的學生一條寬大的工作道路。經孫宥越老師的推薦，首先到內湖區的德明行政管理專科學校（今已改制為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擔任教職。從此十餘年間一直在專科學校服務，做過訓導主任、教務主任，亦擔任過新北市東南工業專科學校（今已改制為東南科技大學）兩個任期共六年的校長職務。東南每年畢業生

5-600 人，總計在教育工作的崗位上，培育了三千多名的專科生進入社會，成為推動社會進步的中堅力量。

伍、主持國立編譯館中小學教科書編審工作

民國七十一年秋，有機緣到國立編譯館擔任聘任編審的工作，起先參與中小學教科書的編審工作，76 年起主持中小學教科書編審工作前後共十一年，86 年調任人文社會組主任，負責編輯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論著，並完成了「教育大辭書」共 10 鉅冊的編輯及出版工作（主任委員是劉真老師），90 年春退休。到今年春天已經退休 15 個年頭了。

國立編譯館成立在民國 21 年。44 年母校改制為師範大學時的文學院院長梁實秋老師和理學院院長的陳可忠老師都曾經擔任過編譯館館長；「巨流河」的作者，台大退休教授齊邦媛老師亦曾在館內擔任過人文社會組主任。他們的學術聲望都很高。可是在外界看來，國立編譯館是個守舊的機構，尤其在若干改革人士的眼裡，這是一所保守固執的大本營，在上世紀 90 年代，所謂教育改革的運動中，視之為去之而後快的改革目標（對象）。

編審中小學各科教科書祇是國立編譯館法定職掌的一部分，可是在外界看來，編譯館是編審中小學教科書獨一無二的機構，把編審中小學教科書的工作當作是唯一的工作，所以在外界的「關注」之下，我們在中小學教科書組的工作者，似乎有些「小人物作大事」的重大使命感。前面所說的各界「關注」，就是對教科書作不斷的批評和要求。要求教科書零錯誤，內容不能太深，亦不能太淺；分量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要求教科書有本土情感，亦要有愛國的情操；要求教科書適合各種不同的學習需要。

中小學教科書不是專門性的著作，並不具有學術性，學術機構的研究人員亦不能憑藉教科書的編輯而申請升等；而且教科書的編輯亦不是一個人能完成的工作。其實教科書只是教材的一種，而不是學生在校學習的全部材料，但一般觀念都以「教科書」為中心的學校教育，賦予「教科書」完全的責任，這是引起對教科書諸多批評的主要原因。

中小學教科書的編輯，是專門性的工作，有一定的實施程序。一套理想適用的教科書，需要一群人來共同參與，這包括課程專家（教育學者），學科專家和從事教學有實際經驗的教師們，大家分工合作，各盡所長；更需要實際使用者回饋的意見，不斷修正。

國立編譯館成立各科教科書編審委員會，聘請上述三類人員為委員。課程專家(教育學者)提供課程架構，確定教材設計；學科專家對該科教材有專精研究，提供「應教」的教材內容，負責教材的正確性；從事實際教學的教師們，提供教材中「能教」的內容，掌握教材分量，並回饋使用者的意見，以供再版時加以修正。

上述三類委員的組成，雖然各有功能，但在實際運作起來還是有很多的缺失：

- 第一、教材編輯過於「理想化」，不能切合實際教學的需要。
- 第二、教材編輯過於「本位化」，重視學科的完整性，強調本身的價值，容易有教材內容過難或分量過多的缺失。
- 第三、教師在教學過程中，不能把握教學目標，不能了解教材的主旨，忽略了教材必須透過教師教學，才能達到效果，強化效果。

所以，教科書的編輯工作，永遠做不好，亦永遠做不完；做不好，因為批評不斷；做不完，因為不斷修正，永無止境。

個人在國立編譯館工作期間(民國71年-90年2月)，在時空背景上，正是一個劇烈變化的時代。我們國家-中華民國，在經濟上，從發展中國家進入開發國家之林；政治上戒嚴時期結束，動員戡亂時期終止(80年5月)，走向全面開放。兩岸關係從嚴峻的對抗局勢中，漸漸走向緩和(76年11月開放大陸探親)-所謂「立足台灣，胸懷大陸，放眼世界」的時代來臨。所以亦增添了對彼岸-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學教科書的研究與了解工作(鄭理事長亦曾參與兩岸中學地理教科書的比較研究)。

在這個時程中，中小學教科書的編輯制度亦有了改變。從全面統編制(一綱一本)到部分開放為審定本(一綱多本)，統編與審定制並行，以至全面開放為審定本。

任何一種制度，都有其時代背景和政治社會的需要。我們不能說那一種制度是絕對的「好」或「不好」，在不同的時空背景下，原先大家稱道的某種制度，亦會變得窒礙難行，制度的改變是必然的。不過中小學教育本身是具有價值導向的活動，負有融和立國精神，培養愛國思想，提升民族文化的使命，斷斷不能在高呼「自由」「開放」的論調下，背棄了教育的基本精神。任何改革的訴求，應該兼顧「理想」與「事實」，「自由」與「規範」。二十餘年來所謂「教改」，其成果今天尚不能評定，但是歷史總會給我們一個交代吧！

六、結語：感謝母校母系的栽培並祝福學弟妹們

今天回顧這一甲子的歲月，林林總總，都已經是回不去的往日舊夢了。感慨之餘，有著兩點想法：

其一，感謝師大(母校) 史地系(母系) 的培育，師範教育讓我不負初衷；「誠正勤樸」的校訓，讓我終生受用。「教育國之本，師範尤尊崇」校歌歌詞，始終在腦海中縈繞不止。

其二，地理學是應用的科學，涵蓋的範圍十分廣泛。師大母校既不以培育中等學校專業師資為唯一重要任務(教育改革中，專業的師範體系已經崩壞)，地理系(母系) 的教育宗旨和課程設計自然亦會配合調整。如何發揮地理學的應用價值，培育地理學界多元的專門人才，母系的任務繁重。在此祝福母系教學成功，地理專業人才輩出，一代勝過一代！